

《史記》在韓國的流傳及影響——以翻譯介紹與研究現狀為中心

On the Spread and Influence of Translations and Studies of the *Shi-ji*
(Records of the Historian) in Korea

諸海星 (Je Hae-sung) *

一、《史記》在韓國的接受及流傳

《史記》是中國史學中一部繼往開來的不朽巨著，作者司馬遷創造的以人物為中心的紀傳體，在漢代以後一直是歷代王朝正史所沿用的體制。司馬遷修《史記》，不僅尊重歷史事實，秉筆直書，而且還注意語言文字的錘煉，文句優美。他把敘事、抒情、說理的不同文體融會貫通，達到思想上、藝術上的高度統一，為後代文史學者提供了範例。《史記》的人物傳記，由於作者善於透過敘述細微情節來刻畫人物的本質特性，使之成為一部歷史實錄，同時也成為一部膾炙人口的中國古代歷史傳記文學的開山之作。宋代史家鄭樵說：「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學者不能捨其書，《六經》之後，惟有此作。」¹ 魯迅譽為：「固不失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² 這些都說明《史記》不僅具有巨大的歷史價值，而且具有重要的文學價值。至於《史記》的學術價值和現代功用，我們可以概括地說：《史記》是先秦文化的總結，是研究西漢前期社會的第一手資料，同時它又是代表漢代最高藝術水準的文學作品，不論在歷史學還是文學、哲學、經濟學、軍事學等各門學科發展的歷史上，都具有至關重要的地位，對後世各門學科的發展都具有深刻的影響。掌握了它就可以

觸類旁通地了解歷史學、文學，以及其他許多學科的諸多問題。³

至於《史記》一書什麼時候傳入古代韓國，最初誰把此書介紹給韓國讀者，從現存韓、中兩國的歷史文獻中，難以查考明確的直接記載。迄今為止，對這些問題韓國學術界不僅沒有明確的答案，而且尚未作全面的調查研究。然而，根據現存韓、中兩國歷史文獻的記載，可以推斷《史記》傳入韓國的時間大概不會晚於中國的東晉時期（317-420），即韓國的高句麗朝（高句麗、百濟、新羅為韓國的三國時代，後來新羅統一三國，改國號為「統一新羅」）。據高麗朝仁宗時期金富軾（1075-1151）編寫的《三國史記》記載，西元 372 年，高句麗在中央「立太學，教育子弟」，⁴ 太學是以傳授儒家經典為主要內容，專門教育王族和貴族子弟的國家最高教育機關。在太學裏，除講授以「五經」為代表的儒家經典以外，還講授「三史」（《史記》、《漢書》、《東觀漢記》）。又據《舊唐書·東夷·高麗傳》（卷 199 上）記載，高句麗人「俗愛書籍，至於衡門廝養之家，各於街衢造大屋，謂之局堂。子弟未婚之前，晝夜於此讀書習射。其書有『五經』及《史記》、《漢書》、范曄《後漢書》、《三國志》、孫盛《晉陽秋》、《玉篇》、《字統》、《字林》；又有《文

* 作者現任韓國啓明大學外國語文學院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嶺南中國語文學會編輯理事。

1 《通志·總序》。

2 《漢文學史綱要》，《魯迅全集》第 9 冊（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 年）。

3 韓兆琦著，《史記通論·前言》（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0 年）。

4 《三國史記·高句麗本紀》，卷 18〈小獸林王〉（漢城：乙酉文化社，1996 年）。

選》，尤愛重之。」由此可知，高句麗朝時，《史記》早已傳入了韓國，並在韓國的知識階層和王公貴族中產生了相當廣泛而深遠的影響。雖然目前我們無法確認，但到了高麗朝時可能有過木板本《史記》的出現，《史記》由此更廣泛普及，更受到重視。到了朝鮮朝世宗年間（1425），朝廷鑄字刊印《史記》，頒贈文臣。到了16世紀末17世紀初，崔崑編纂的《漢史列傳抄》出刊，1612年車天輅刪訂的《史纂抄選》與《史纂全選》出刊以後，凌稚隆校點的《史記評林》與《增訂史記纂》以及撰者不明的《史漢一統》陸續刊出。其中，《史記評林》是一部《史記》原文完整本，對當時文人鑽研《史記》提供了有利的條件。最後到18世紀末19世紀初又發行《英選史記》，從此《史記》在韓國的普及更為廣泛。

下面分別說明《史記》在韓國的翻譯介紹與研究現狀。由於限於資料和時間，難免有錯誤和不足，懇切地希望學術界的專家、學者給予批評指正。

二、《史記》在韓國的翻譯介紹

如上所說，《史記》不僅是中國紀傳體史書的開創者，而且對後世的散文、小說、戲曲等文學作品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同時它也早已流傳至國外，在漢文化圈國家中亦有不少的影響。其中，《史記》傳入韓國，特別受到韓國知識界人士的關心和推崇，為韓國學術界所重視。⁵然而，正當近代學術研究開始發展時，由於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和統治，韓國對中國學術文化的關心及研究幾乎處於停滯狀態。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誕生的大韓民國（1948年8月15日建國），由於受韓國戰爭（1950-1953）的影響，其經濟恢復時期，長達15年之久，當時對中國學術文化的關心及研究幾乎處於癱瘓狀態。舉個例子來說，1960年代以前，韓國的出版事業十分落後，僅有出版社200多家，出版規模頗小，資金短缺不足，圖書發行數量極少。據《韓國出版年鑑》統計，1948年8月15日光復後的第一年，共出書202種，自1948年至1960年間，平均每年出書約1,300種，大多是教科書、文藝和普及類書，真正反映生活、科學方面

的圖書不多，尤其是人文科學、社會科學等高水準學術的圖書，增加十分緩慢。到1960年代中期，隨著國家經濟的發展，韓國整個社會的發展進入了一個歷史的新時期，不僅國家面貌發生了根本變化，學術文化事業也步入正軌，同時韓國學術界對中國學術文化的關心及研究也重新得到了高度重視。正是在這樣的基礎上，韓國學者對《史記》的翻譯和研究有了較大的發展，在傳播、普及和通俗化方面有了積極的貢獻。

自1960年代中期至1999年，在韓國已出版的韓文《史記》翻譯本（包括全譯本和節譯本）共20餘種。第一部《史記》韓文翻譯本《史記列傳》（漢城：玄岩出版社，1965年），由韓國漢學家崔仁旭完成。此書既是第一部韓文翻譯本，又有助於克服《史記》原文文字上的障礙，對廣大初學者提供了極大的方便。十年後，此書譯者在原韓譯本的基礎上，又與金榮洙合作，重新修改和補充，並完成《史記列傳》2冊（漢城：東西文化社，1975年）。

此後，李英根（永茂）根據日人丸山松幸等人編譯的《史記》重譯成韓文，共出《霸者的條件》、《亂世的群像》、《支配的力學》、《權力的構造》、《思想的命運》、《歷史的低流》等6冊（漢城：新太陽出版社，1973年）。此書雖不是《史記》的全譯本，但具有較濃的教訓性和趣味性，既能使廣大讀者了解《史記》的全貌，又有利於《史記》在韓國的推廣。

另一部韓譯本《史記列傳》出於中國文學研究專家文璇奎（前全南大學中文系教授）之手，全書共3冊（韓國自由教育協會，第1冊，1973年；第2冊，1974年；第3冊，1979年）。此書以具有中等以上文化程度的廣大讀者為對象，在強調通俗性的同時，對傳播和普及中華民族優秀的傳統文化也有重視，可以說是中國古籍韓譯事業的一種新的嘗試。幾年後，此書譯者在原韓譯本的基礎上，重新作了修訂工作，並完成《史記列傳》2冊（漢城：三京堂（音譯）出版社，1985年），作為《世界古典全集》之一種。

不僅如此，洪錫寶（前漢陽大學歷史系教授）也完成另一部韓譯本《史記列傳》（漢城：三省出版社，1977年），並將此書作為《世界思想全集》之一種，使

5 在朝鮮朝學人文集所載的有關司馬遷及《史記》的部分論述，請參看文末附錄。

《史記》成為世界思想文化寶藏的重要部分。十幾年後，此書譯者在原韓譯本《史記列傳》的基礎上，又與小說家金並總攜手合作，以小說形式完成韓文全譯本《史記》10冊（漢城：集文堂出版社，1994年）。廣大韓國讀者借助於洪、金兩氏的譯文，終於有機會較全面地欣賞這部傑出的中國古典不朽巨著。

此後，中國語言學研究專家成元慶（建國大學中文系教授）也譯注《史記列傳要解》（漢城：曙光社，1980年）。12年後，此書編譯者又以原文對譯形式重新整理，並編譯成《史記列傳精解》1冊（漢城：明文堂出版社，1992年）。此書在篇目的取捨上，首先重點選取《史記》「列傳」部分中具有典型意義的歷史人物50人，又兼及歷史上膾炙人口、深入人心的英雄人物；既考慮到所選歷史人物為廣大讀者了解並可作為借鑒，又顧及各篇是否能全部譯成現代韓語的實際情況。《史記》在韓國的翻譯和介紹之下，到80、90年代又紛紛問世了一批韓譯本。如漢學家南晚星譯注的《史記列傳》2冊（漢城：乙酉文化社，1983年），並將此書作為《世界思想全集》第3、4卷。漢學家李相玉譯注的《史記列傳》3冊（漢城：明文堂出版社，1986年）。「史記列傳講讀會」譯注的《故事史記列傳》3冊（漢城：清雅出版社，1988年）。姜英敏譯注的《實錄史記列傳》（漢城：昌佑出版社，1991年）。漢學家權五鉉譯注的《史記列傳》（漢城：一信書籍出版社，1991年）。崔大林譯注的《史記本紀》、《史記世家》（漢城：洪信文化社，1993年）。蘇俊燮編譯的《史記》3冊（1993年），是一部通俗性與閱讀性較強的《史記》編譯書，對《史記》在韓國國內為一般大眾所接受有一定的貢獻。金元中譯注的《史記列傳》2冊（漢城：乙酉文化社，1999年）。

除此以外，自1992年至1996年，在中國文學研究專家丁範鎮（成均館大學中文系教授）率領下，以成均館大學中文系博士生為中心的青年學者，共同參與了《史記》全文的韓譯工作。此書共7冊，分為「本紀」1冊，「表、書」1冊，「世家」2冊，「列傳」3冊（漢城：喜鵲（意譯）出版社，1994-1996年）。丁範

鎮教授在首冊裏的〈解說〉中，對《史記》的名稱、體例和成書經過，以及司馬遷的時代、生平和思想分別作了較全面的論述和評價，「本紀」書末還附有「自夏至前漢的歷代世系表」以幫助一般讀者了解和認識《史記》內容所涉及的歷史年代概念。另外，1993年至1997年間李炯基著饒富趣味的《當代人讀的《史記》》出版，同時日人武田泰淳所著（李蔣軒譯）兼具可讀性及學術性的《與司馬遷共遊歷史紀行》（原書名：《司馬遷《史記》的世界》），與貝塚茂樹著（朴宰雨譯）的《隨筆《史記》——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原書名：《史記》），以及林田慎之助著（沈慶昊譯）的《司馬遷其人》（原書名：《人物司馬遷》）韓譯本陸續出刊，從此，司馬遷與《史記》更為韓國一般讀者所認識。

總歸來說，翻譯是文化傳播的重要媒介，韓文《史記》的大量翻譯和介紹，不僅為韓國人民對了解司馬遷及其不朽巨著《史記》提供了極為有利的條件，而且通過《史記》的傳播，韓國人民對認識中國古代文化的發展歷程也有了進一步的了解。

三、《史記》在韓國的研究現狀

自從1960年代以來，韓國學者對《史記》更是投注了相當的研究精力，並取得了不少可觀的研究成果。據徐敬浩（國立漢城大學中文系教授）編的《韓國中國語文學研究論著目錄（1945-1990年）》⁶和徐敬浩、金時俊（前國立漢城大學中文系教授）共編的《韓國中國學研究論著目錄（1945-1999年）》⁷提供的材料看，1970年代以前在韓國關於司馬遷及《史記》的研究，除大學教材《東方文化史》和《中國文學史》的一些簡略介紹之外，幾乎找不到任何一篇論文和專著。雖然1958年洪淳昶（前嶺南大學歷史系教授）在《大邱大學學報》第32號上發表了〈司馬遷與《史記》〉一文，但是這些介紹和解說性的文章還算不上是真正進入研究階段。從學術研究的角度考察，直到1971年以後，韓國學者對《史記》一書的研究才算有了起步。然而，至今韓國對《史記》研究的發展速度可說是相當快速的，自

6 漢城：正一出版社，1991年10月出版。

7 漢城：松樹（意譯）出版社，2001年2月出版。

1971年至1999年的29年間，在韓國國內學術刊物上發表的研究論文共有60餘篇，碩、博士論文有20餘篇（包括韓國留學生在臺灣及中國大陸撰寫的碩、博士論文），其數量和內容都有長足的發展。從研究內容的範圍看，主要有司馬遷的生平與思想研究、《史記》的歷史性質研究、《史記》的語法研究、《史記》的文學性質與文學成就研究、《史記》的總體研究、《史記》與《漢書》比較研究等方面。這些多方面的研究成果，無論從學術研究的方法上，還是在內容或水平上都開創了一個新時代。

（一）關於司馬遷生平與思想方面的研究論著，主要有以下幾篇：

1. 李章佑（嶺南大學中文系教授），〈《漢書·司馬遷傳》考釋〉，《中國文學報》第1號（檀國大學，1974年）。
2. 鄭杜熙，〈關於《史記·伯夷列傳》的考察——司馬遷的思想傾向〉，《全海宗博士華甲紀念史學論叢》（漢城：一潮閣出版社，1979年）。
3. 李寅浩（漢陽大學中文系教授），「司馬遷述儒家思想之研究」（國立臺灣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1985年）；〈司馬遷之思想淵源〉（中文論文），《中國語文論叢》第1輯（高麗大學中國語文研究會，1988年）；〈司馬遷的黃老思想〉，《道教學研究》第14輯（韓國道教學會，1996年）。

（二）關於《史記》歷史性質方面的研究論著，主要有以下幾篇：

1. 權鍾川，〈關於《史記》編纂與韓國史料的研究〉，《忠北大論文集》第3號（國立忠北大學，1972年）。
2. 李成珪（國立漢城大學歷史系教授），〈《史記》中的歷史人物〉，《文理大學報》第28號（國立漢城大學，1974年）；〈《史記》中的歷史與人物〉，《文理大學報》第29號（國立漢城大學，1975年）；〈《史記》歷史敘述的特性——文史一體的典型〉，《外國文學》雜誌冬季號（1984年）；〈《史記》的歷史敘述與文史一

體〉，《中國的歷史認識》⁸；〈司馬遷的時間概念與《史記》的敘述〉，《東方學誌》（1991年）；〈朝鮮後期士大夫對《史記》的理解〉，《震檀學報》（1992年）；〈朝鮮學人之《史記》研究二種介紹〉，《國立漢城大學東方歷史系論集》（1992年）。

3. 洪淳昶，〈《史記》的世界〉，《全海宗博士華甲紀念史學論叢》（1979年）。
4. 張基槿（聖心女子大學中文系教授），〈《史記》的人物學〉，《新東亞》雜誌第218號（1982年）。
5. 俞德朝，〈《史記》「太史公曰」的意義〉，《史鄉》（公州師範大學，1985年）。
6. 金美貞，「關於〈史記〉的曆書思想與統一的研究」（曉星女子大學歷史系碩士論文，1989年）。
7. 崔秉洙，〈關於司馬遷的「成一家之言」〉，《忠北史學》（國立忠北大學，1991年）。
8. 李吳映，「秦漢宗教思想與封禪研究——以《史記·封禪書》為中心」（西江大學歷史系碩士論文，1992年）。
9. 李文揆，〈古代中國「天文」解釋的原理——以《史記·天官書》為中心〉，《東亞文化》第35輯（1997年）。

（三）關於《史記》語法方面的研究論著，主要有以下幾篇：

1. 許璧（延世大學中文系教授），「《史記》稱代詞與虛詞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所博士論文，1975年）；〈研究《史記》語法的動機〉（中文論文），《中韓文化論集》（中華學術院，1975年）；〈《史記》單位詞研究〉，《延世論叢》第21輯（延世大學，1985年）；〈《史記》和《三國史記》的比較研究——以第一人稱代詞為中心〉（中文論文），《第五屆世界華語文教學研討會論文集》（1997年）。
2. 尹上林，「《史記》被動句類型研究」（延世大學中文系碩士論文，1989年）。

8 閔斗基編，漢城：創作與批評社，1985年。

(四) 關於《史記》文學性質與文學成就方面的研究論著，主要有以下幾篇：

1. 李漢祚（前高麗大學中文系教授），〈伯夷與司馬遷——作為總序的《史記·伯夷列傳》〉，《大東文化研究》第8輯（成均館大學，1971年）；〈關於《史記·項羽本紀》〉，《淑大論文集》第12輯（淑明女子大學，1972年）。
 2. 李章佑，〈《史記·伍子胥列傳》的構成〉，《東洋學》第2輯（檀國大學，1972年）。
 3. 洪淳昶，〈論司馬遷的文學觀念——以《史記·屈原賈生列傳》為中心〉，《中國語文學》第3輯（嶺南中國語文學會，1981年）。
 4. 林春城（木浦大學中文系教授），〈司馬遷的文學理論與文藝批評——以《史記》議論文為中心〉，《中國學研究》第3輯（韓國外國語大學，1986年）。
 5. 朴宰雨（韓國外國語大學中文系教授），〈《史記》的文學性質及其特性考〉，《韓國外大論文集》第20輯（1987年）。
 6. 李星（清州大學漢文教育系教授），〈通過小說文學的觀點來看《史記·項羽本紀》〉，《中國語文學研究論叢》⁹（1991年）。
 7. 郭廷植（音譯）（慶星大學國文系教授），〈從宏觀觀點看《史記列傳》與小說的關係〉，《慶星大學論文集》第13輯第3卷（1992年）。
 8. 權錫煥，〈《史記》「傳」體裁的考察〉，《中國小說論叢》第3輯（韓國中國小說學會，1994年）。
 9. 沈揆昊，〈從文藝心理學觀點看「發憤著書」——以屈原與司馬遷為中心〉，《中國語文學》第29輯（嶺南中國語文學會，1997年）。
 10. 洪尚勳，〈司馬遷的敘事論〉，《中國小說論叢》第8輯（韓國中國小說學會，1998年）。
 11. 金利湜，「司馬遷的文學理論與批評」（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所碩士論文，2000年）。
- 此外，關於《史記》寫作技巧與人物描寫方面的研

究論著，主要有以下幾篇：

1. 朴宰雨，「《史記》的寫作技巧研究」（國立臺灣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1982年）；〈《史記》寫作技巧舉例探討〉（中文論文），《中語中文學》第6輯（韓國中語中文學會，1984年）；〈《史記》寫作技巧的抽樣分析——以〈項羽本紀〉與〈商君列傳〉為例〉（中文論文），《中國研究》第8輯（韓國外國語大學，1984年）；〈《史記》寫作技巧的抽樣分析——以〈留侯世家〉、〈田單列傳〉、〈李將軍列傳〉為例〉（中文論文），《韓國外大論文集》第18輯（1985年）；發表中國學者殷孟倫所著〈試論司馬遷《史記》中的語言〉¹⁰的韓文翻譯論文，《語言與語言學》第16輯（1986年）。
2. 金聖日，「《史記》修辭技巧研究」（臺灣高雄師範學院國文所碩士論文，1984年）；〈《史記》褒貶義法淺談〉，《中國人文科學》第6輯（1987年）；〈《史記》譏刺技巧小考〉，《中國人文科學》第8輯（1989年）；〈《史記列傳》人物描寫技巧小考〉，《中國人文科學》第11輯（1992年）；「《史記列傳》的人物描寫技巧研究」（國立全南大學中文系博士論文，1994年）。金聖日的這篇論文是韓國國內中文系培養出第一部研究《史記》的博士學位論文，他從西方傳記、現代小說的文章運用技法、人物描寫論、對話方法論等寫作技巧理論角度入手，對《史記列傳》的寫人技巧作了較為深入的探討。這篇論文不僅重點論述了描寫人物的基本態度和具體方法（包括場面描寫、要約、記述、評論、互見）及兩個觀點（褒貶、因果報應），而且將提示人物的具體方法分為兩種：一是直接提示方法，二是間接提示方法（包括事件描寫、背景提示、行為描寫、對話描寫、獨白描寫、心理描寫、逸聞描寫、對比描寫、烘托），並對這些具體方法分別作了較為詳細的論述；〈《史記列傳》的獨白描寫小考〉，《中國現代文學研究》

9 《魯城崔完植先生頌壽論文集》（漢城：學古房出版社，1991年）。

10 原載《文史哲》1956年第1期。

第6輯（1997年）。

3. 林春城，「《史記》議論文的内容與技法分析」（韓國外國語大學中文系碩士論文，1986年）；〈《史記》議論文的修辭技巧分析〉，《中國語文論集》第3輯（釜山慶南中國語文學會，1986年）。
 4. 金苑（暎園大學中文系教授），「《史記列傳》義法研究」（國立政治大學中文所博士論文，1989年），就《史記列傳》的義法，分「顯示之精神」（追求仁政、崇尚禮義、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人文主義），「類型」（形式、内容），「篇法、章法」，「句法、字法」等四項，加以分析和探討。
 5. 李寅浩，「《史記》文學價值與文章新探」（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所博士論文，1991年）。全書内容大約分歷來研究《史記》文章的概況、《史記》的文學價值、《史記》的文章新探等三個部分，主要對以往研究成果進行系統且全面的梳理，並對《史記》的文章和文學價值作了較為詳細的分析和探討。值得注意的是，在〈《史記》之文學價值（描繪人物之上品）〉一文中，他將《史記》全書的人物描寫技法分為說明與暗示、浮刻、側面描寫、對話、心理描寫等五種技法，並對這些技法一一作了詳細的說明和例證；〈《史記》人物描寫研究(1)——《史記》人物描寫研究史略〉，《中國語文論叢》第7輯（1994年）；〈《史記》人物描寫研究(2)〉，《中國語文論叢》第13輯（1997年）。
 6. 李承信，「《史記列傳》人物形象研究」（梨花女子大學中文系碩士論文，1994年）。
 7. 安辰赫，「《史記》人物傳記的文章技法研究」（國民大學中文系碩士論文，1996年）。
- （五）關於《史記》總體方面的研究論著，主要有以下

幾部書：

1. 洪淳昶，《《史記》的世界》（嶺南大學出版部，1982年）。此書是在韓國出版的有關司馬遷及《史記》研究的第一部單行本專著，内容主要有：司馬遷的生平、《史記》的時代、《史記》的寫作過程、《史記》的體裁及内容、《史記》的世界。文末附有〈司馬遷及《史記》年譜〉。
2. 李成珪編譯，《《史記》——中國古代社會的形成》（國立漢城大學出版部，1987年）。此書所談到的旨趣，是中國古代社會的形成，除了《史記》29篇的韓文翻譯外，在〈《史記》解說〉一文中，對《史記》的著述動機和目的、史料的批判和取捨、體例與敘述上的特點等方面作了全面的概述和評論。這是一部從歷史學角度研究司馬遷及《史記》的中國古代史參考書，但它内容豐富，涉及的範圍較廣，對從文學的角度研究司馬遷及《史記》頗有參考價值。可以說是一部歷史知識和文學知識相融合的結晶，具有融學術性、知識性、通俗性為一體的顯著特色。
3. 朴惠淑編譯，《司馬遷的歷史認識》（漢城：韓吉社（音譯），1988年）。這是一部由譯者選取4篇中國論文和1篇法國論文（以日譯本為底本）及一本美國專著，譯成韓文的司馬遷及《史記》研究論文集。此書選取的中國論文有：殷孟倫的〈略談司馬遷現實主義的寫作態度〉；¹¹ 侯外廬主編的〈司馬遷的思想及其史學〉；¹² 任繼愈的〈司馬遷的唯物主義思想及其進步的社會歷史觀〉；¹³ 蘇仲翔的〈試論司馬遷的散文風格〉。¹⁴ 法國論文有 Chavannes 著《司馬遷的歷史敘述》〈序論〉中的第3章第2節〈司馬遷所活用的資料〉，譯者翻譯時以該書的日譯本《司馬遷與《史記》》¹⁵為底本。美國專著有 Burton Watson 的《偉大的歷史家——司馬遷》。¹⁶ 朴惠淑編譯

11 原載《文史哲》1955年第2期。

12 原載《中國思想通史》第2卷第4章。

13 原載《中國哲學史》第2卷第7章。

14 原載《文學遺產增刊》1956年第4期。

15 岩村忍譯，東京：新潮出版社，1974年。

16 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出版部，1958年。

的這部論文集雖是從文史哲各個角度收集的文章，但因為原作者都是對司馬遷和《史記》頗有研究的學者，他們的論文內容豐富，涉及面很廣，加之，中國傳統文化中，文史哲不分家，所以大部分文章從文學的角度來理解，也是很有價值的。

(六) 關於《史記》與《漢書》比較方面的研究論著，主要有：

朴宰雨，「《史記》《漢書》傳記文比較研究」（國立臺灣大學中文所博士論文，1990年）；〈簡論《史記》《漢書》著述精神之分歧〉（中文論文），《中國語文學研究論叢》（魯城崔完植先生頌壽論文集），1991年；此篇博士論文又以《《史記》《漢書》比較研究》為題，在中國大陸出版，作為《中外學者學術叢書》之一種（北京：中國文學出版社，1994年）。《史記》研究專家韓兆琦（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教授）對此書有較高的評價，他在此書裏的〈序言〉中說：「首先分析總結了歷代研究『史漢異同』的狀況，涉獵該博，條理清晰，使人一覽之下，頓時將這一部分學術史瞭然於心。接著這本書便從『史漢總體』、『史漢傳記文的編纂體例、形式、人物』與『史漢傳記文的寫作技巧』三方面將《史記》、《漢書》的相關部分條分縷析地一一進行了詳細勘比。其用功之勤，其思想之細，其所表達的觀點之準確明晰，都是令人歎服的。例如朴先生將《史記》、《漢書》所顯示的各自作家思想傾向的區別概括為『《史記》通變古今與《漢書》尊顯漢室』；『《史記》兼尊儒道與《漢書》獨尊儒術』；『《史記》兼顧民間與《漢書》傾向上層』；『《史記》感情移入與《漢書》不失客觀』四條，真是歸納得既全面，又扼要。」由此可以說，此書將來對《史記》研究，《漢書》研究，以及《史記》、《漢書》的比較研究是有重要參考價值的；1997年他還發表了〈《史記》與《漢書》異同研究史略〉（中文論文），於《當代海外漢學研究》（江蘇：人民出版社，1997年）。

四、結語

綜觀韓國學者對《史記》的研究，近二十年來進步較快，逐步建立了相當良好的研究環境，並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果。這不僅表現在論著的數量上，也同時表現在論著的內容上。這些《史記》論著的內容不但較為翔實，而且也有相當的理論深度。特別是1980年代以後，由韓國國內中文系及臺灣的中文研究所培養出一批專門研究《史記》的青、壯年學者，如朴宰雨、李寅浩、金聖日等，不僅揭開了韓國《史記》研究史上的新篇章，而且為後來研究《史記》打下了堅固的基礎。不過，韓國的《史記》研究也存在著不少問題，是今後韓國學者非解決和突破不可的。首先，韓國學者應對《史記》本身進行深入的研究，並在觀念和方法上採取新的嘗試。其次，應共同努力收集古代韓國有關《史記》研究的資料，加以分析整理，重新做一個《史記》接受及流傳的研究，並對朝鮮朝有關司馬遷及《史記》論述的學人文集的片斷資料，做一番詳細的檢討和研究分析。¹⁷最後，應從韓中比較文學的角度研究《史記》，如《史記》與《三國史記》、《史記》與其他韓國史書間有關文學性質和文學成就的比較、《史記》對韓國傳記文學與散文以及小說等的影響等。

無論如何，中華民族數千年的文明歷史，產生了輝煌燦爛的文化。作為中國文化的先驅和精髓——司馬遷和《史記》，它不僅對中國古代社會的形成和歷史的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凝聚力，對今天在漢文化圈內的東方人弘揚傳統人文思想，建設高度精神文明，也有巨大的意義。這些寶貴的精神財富，已成為東方文化重要的寶藏，不僅是中國人的驕傲，也是全東方人的驕傲。我們相信，《史記》在韓國的翻譯介紹與研究，不僅對傳播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作出了一定的貢獻，並且加強了韓國人民對中國文化的了解和認識。這正是韓中兩國人民的友好往來和文化交流史上極為珍貴的一頁。

17 國立漢城大學歷史系李成珪教授曾對朝鮮朝士大夫理解《史記》情況加以一番大整理。他檢討16世紀末以後朝鮮文人留下的文集大略1200種，最後確認105種文集裏包含有關司馬遷及《史記》的論述，總共有500多件。他把500多件分為四類：有關體例及書法論的有364件，有關文體與文章論的有26件，有關考證與注釋的有26件，有關褒貶與評價的有100件。由此可以推知韓國研究《史記》也有幾百年的歷史了。

附錄：在朝鮮朝學人文集所載的有關司馬遷及《史記》的部分論述：

1. 許穆（1595-1682）《眉叟記言》卷58〈文章〉（《史記》文章論）：

自東周以降，孔子歿，周道衰，諸侯更霸，百家起，至秦專用術，焚滅詩書，天下大亂，聖人之文，貳於老氏，散於百家，然去古未遠。天地純厚之氣猶在，屈原作《離騷》，馬遷紬《史記》。自黃帝始，至于麟趾，揚雄作《太玄》、《法言》，揚雄死，古文亡矣。

2. 李宜顯《雲陽漫錄》（尊崇司馬遷文章）：

本朝諸鉅公，乖崖（金守溫），占畢（金宗直），其尤也。而不過以韓（愈），蘇（軾）為範而已。簡易（崔嵬），月汀（尹根壽），始以班馬，揭示後學，時尚為之一變。

3. 鄭杕（1601-？）《愚川先生文集》卷4〈馬史刪節識語〉（批判司馬遷文章）：

馬史文有重複處冗長處，自是力量闊大，不拘精密，固不為大病。然朱絃疎越，合於古而不諧於今，後學之不能及其力量，而反有學步之譏焉……余既譏孟堅而，又為是刪節者，蓋非以史傳筆削自居也。姑取抄本若干篇，只刪其重複冗長處，以遺一家子弟，卑免學步之謬耳。

4. 洪良浩（1724-1802）《耳溪集》卷17〈太史公改古文論〉（批判司馬遷文章）：

經之文，典而嚴，史之文，質而辨。太史公之作史，變其體固也……太史公改古文，而創史體，或犯於俚俗，寧不惜哉！後之人尊太史，為古文之祖，而余則，謂未必然也。

5. 正祖大王（1752-1800）《弘齋全書》卷162〈日得錄〉（馬班優劣）：

《史記》五十一萬六千五百言，序二千四百一十三年事。漢書八十一萬言，序二百五十年事，優劣可知矣。

6. 正祖大王《弘齋全書》卷165〈日得錄〉（史漢文比較）：

班固之文精切，有勝似馬遷，力量大自不及。司馬遷文章亦帶戰國縱橫之習，觀司馬遷自序，便自任以聖人之統，文人習氣有如此。經典以外，惟史漢最堪多讀，以其質厚而致深，意味無窮，然漢則終是，為繩墨拘束，故文字外，不見餘地，不如子長之豪宕雋潔也。

7. 正祖大王《弘齋全書》卷172〈日得錄〉（張良從容）：

《史記》張良傳云（從容步遊下邳），從容步圯上，此政善形容文字，大抵張良一生，掀天動地底事業，不過從「從容」二字中推出來。

8. 桂德海（1708-1775）《鳳谷桂察訪遺集》卷6〈讀史纂〉（史漢文比較）：

其人好奇，故三千餘年，得五十餘萬言，簡之又簡。漢武帝之為君，子長之為文，不可與拘曲士道，文無書生氣。

9. 桂德海《鳳谷桂察訪遺集》卷6〈讀太史公書〉：

熟讀涵泳之，令其漸漬汪洋。諸篇體格各樣，句法昭暫，分析於目中，又多般字類銷鑠融液於胸中。讀史如騎鐵馬，馳騁於千畝王竹之田，於其幹摧節斷處，見勁直之性，疎爽之韻。

10. 丁範祖（1723-1801）《海左先生文集》卷38〈馬史評〉：

子長敘劉（邦），項（羽）鴻門之會，主客君臣坐嚮，分明如畫。如此然後，（范）增之目，（項）羽之默，（項）伯之舞，張良之知意在沛公，皆得之一席樽俎，精神氣色之間，而為之應變。此固子長極力鋪置處，孟堅削之，而全沒肯綮。

11. 朴文鎮（19世紀末人）《壺山集》卷76〈論史〉（列傳中合傳例）：

史家為人立傳，或特立而獨，或比擬而合傳，此例既立，則思過半矣。且合行文之例，如《史記》張蒼申屠嘉魏其武安等傳，方是活法，後世史家無此法。

12. 姜彝天（1768-1801）《重菴稿》卷5〈讀史言〉（廉頗藺相如列傳）：

廉藺趙三傳，又是一體，或離或合，一團混成，始紀廉頗，乍起陡斷，中與藺相如，串捏說去，末又於趙括事後，收殺廉頗，不略排鋪，亦蘊密，亦錯落，蓋集（張）耳（陳）餘兩傳魏其武安灌夫三傳諸格法之長。

13. 姜彝天《重菴稿》卷5〈讀史言〉（孟子荀卿列傳）：

其敘荀卿也，則使下於孟子，高於諸子者，意自見，何等量度律尺，故篇名曰孟子荀卿列傳。

14. 姜彝天《重菴稿》卷5〈讀史言〉（管晏列傳）：

晏平仲之事，可記者甚多，而讀於越石夫事特詳，觀其

旨意，又在越石夫者，重彼不但爲苟借其地耳。晏平仲之知人得士，太史公於古之人，有可傳實者，終不餘力而遺之。左氏亦嘗記狼譚事，彭衙之役，御者之妻之事亦然。然則烏在乎其傳晏平仲哉！故其贊論曰其佚事而自解，其實非爲佚事而已。奇人奇事，俱出晏相國傳中，仍以成晏平仲傳之奇。

15. 姜彝天《重菴稿》卷5〈讀史言〉（匈奴列傳）：

……其末略記李將軍陵能戰狀，終之以李廣利之降匈奴事，而天子之詔捕隨但，天子意欲明李廣利之降匈奴，非戰之罪，亦非廣利本心也。其傳論之終，又歸重重言，擇任將相，太史公又憂慨發憤，盡之匈奴傳一篇。

16. 李敏求（1589-1670）《讀史隨筆》卷1（太史公多貶武帝）：

太史公書其不足於武帝者多矣。至於匈奴傳贊曰：孔氏著《春秋》，隱桓之間則章，至於定哀之間則微，爲其切當世之文而罔褒，忌諱之辭也。其指意已可見，而至於封禪書平準書酷吏列傳，亦太章矣。書成不敢顯諸通邑大都，欲藏之名山，其慮患深矣。然竟不免宣帝之誅，而王允謂謗書，書何可易言。

17. 李敏求《讀史隨筆》卷1（魏豹彭越贊）：

太史公魏豹彭越贊曰：智略絕人，獨患無身耳，得攝尺寸之柄，雲蒸龍，變欲有所會，故幽囚而不死，季布贊曰：彼自負其材，故受辱而不羞，欲有所用，其不足（原文：其未足也，故終爲漢名將）。賢者誠重其死，不婢妾賤人，感慨而自殺者，非能勇也。其計劃無復之耳，以喻其幽於縲紲，身不用，而不能自引決，蓋爲卒成漢史耳。

18. 李敏求《讀史隨筆》卷1（史氏記隱密之言）：

天下已定，敵國之患已盡，而高帝老，太子弱，當時之虞，在於彊諸侯王而已。高祖呂后之心，何嘗一日，而忘韓信也。至是而信無可全之道矣。上心所在，下之應之，猶懸金而買首，況呂氏爲之，內主哉，不然則，與上信幸之臣，一朝辭訣之際，遽發逆亂之謀，握手提耳之言，令舍人弟得以聞知，似無近理……其後呂后令彭越舍人，告越復謀叛，夷三族，亦猶是也。史氏記幽閹隱密之言，多以意會，疑似傳信，如李園妹勸春申君，納己於楚王，生子立爲王，誰得以聞之，韓信舍人之聞信密語，亦無證之事，故竝及園妹之說。

19. 李象秀（1820-1882）《悟堂集》卷15〈酷吏傳評〉（酷吏列傳）：

太史公酷吏傳全爲武帝重法而發……則酷吏皆武帝教之也。太史公之意可見矣……於諸人皆深惡，而痛斥之，皆由身被重刑，其疾吏悲痛之情，不得不然，而疾惡如仇之性，使人三復流涕。

20. 李象秀《悟堂集》卷15〈貨殖傳評〉（貨殖列傳）：

論者謂貨殖傳譏人君之好貨，平準書譏人臣之興利。今攷之，平準書譏切當時，如孔僅弘羊之輩侵小民之利，海內以貧，其說甚信矣。若此傳則不必如斯解矣。蓋太史公觀天下之人，無貴賤賢不肖竝歸趨利……世道漸下，俗尚大舛，深有所傷感，故創立此傳。深鉤人情，切中世諱，其慨嘆之意，往往可見，如天下熙熙，皆爲利往來，天下攘攘，皆爲利往，一節，作傳之主意也。其自巖穴隱居以下，全篇之正論也……或云，述貨殖而備載天下風土者，何也。曰此所以爲貨殖之本也。貨殖不出於農工商賈，欲爲四者，則先審風土之宜，然後土地之肥瘠，物產之饒薄，民俗之善惡，俱運于掌，方可覘其賤而射其貴，以所鮮而易所多，不審乎此，而徒欲微利，則是冥行也。故極其情狀，縷縷不厭云。

太史公之文，最善於開闔，泰山之陽則魯，其陰則齊，以泰山分開齊魯，如巨略敘漢興以前富家，以秦皇帝點綴之，其下陡然接入漢興，此所謂文章接橋處也。不見斷落之痕，又不接敘富者，以四方風土承之，如神龍縱水，不測其所終也。經營天下，縱橫錯綜，深林窮谷，僻遠荒服，殆無所不到，然後接「以此觀之」，此則文章過渡處也。斷岸千尺，氣勢嶄然，攷其脈絡所接，則又上承，「豈非以富耶」一句，眞屠龍縛虎之手也。靈劈萃，訝然中分，胸膈以北，俗則齊，浙江南，則越吳在其間，不究自見，如禹鑿呂梁，下流自泄。

21. 金謹行《庸齋集》卷13〈太史公游俠傳後〉（游俠列傳）：

俠於道左矣。任智勇，重然諾，輕千駟萬乘，其爲道，落拓魁絕，不合於中和，故吏不赦而君子賤之矣。然世教日下，民情益渝，嗜慾鬥而氣概喪，勢利眩而恩仇忘。夫所謂斬恩市義者，又不可得見，則太史公游俠傳之所以作也。在昔李陵恃孤軍，陷虎穴，苟延一死者，蓋爲異日圖也。其心苦矣，其跡危矣。當是時，人皆曰陵可族，惟公慷慨，嘗三寸之管，訟怨於人主之前，竟蹈蠶室之禍，而世無賢豪可以緩急，則俯仰噫嘻，愚思乎劇猛郭解之徒者，其志悲哉！

22. 魏伯珪（1727-1798）《存齋集》卷 11〈伯夷傳說〉（伯夷列傳）：

……竟遭腐刑，爲世棄人，故遂作《史記》。蓋欲托之《史記》，以顯志氣，以著文章，傳之後世也。自黃帝以下，可立傳者，非只一人，而特有感於夷齊，蓋夷齊以得仁之人，聖於清者，而不遇於世，逃於北海……幸有尼丘夫子，朝暴相遇，稱之曰得仁，贊之曰何怨……惟彼伯夷，可謂遇知己於身後矣。伯夷死後千年，許多賢豪枉人，大小不同，含冤結憾，不知其幾人，而蠶室腐刑，未必非我安適歸之一人也。遂以伯夷傳爲首，以瀉其意……司馬氏之作此傳，蓋欲後人之知其心，而不埋沒其名也，而于今三千年，無一如其意而知之者，故許多批評註釋，皆不得快活明白。文士讀誦者，只讀司馬遷，而不讀伯夷傳，九原之馬遷得又無怨乎！

司馬遷文章才識，漢興後一人。

23. 魏伯珪《存齋集》卷 11〈史略說〉（《史記》文章論）：

竊觀史略第一卷，自黃帝以下，抄取馬史，而書法簡而

盡，略而該，甚精妙切，至有不可以言語形容者……雖然其極妙處，在有虞以上，可與周易書典謨詩雅頌比竝，而夏后以下之周赧王次之。春秋戰國史斷，司馬遷神髓，自吳姬姓至是，爲秦始皇帝，萬古史編之宗也。削筆之簡嚴，列書之綜綴，與奪之精王，文法之平鋪，事實之詳備，有非筆士墨人所能爲者。

24. 李種微（1731-1786）《修山集》卷 10〈題滑稽傳後〉（滑稽列傳）：

……太史公多憑野史而爲之，野史亦出於俚說野言者多，如優旃孟是也。高句麗史愚溫達傳，亦出於野言，余兒時嘗從野人，聞俚言公主樵兒事，及觀溫達傳如合符契。蓋故老相傳，而至於正史，未必其說爲真，然史者疑以傳疑，雖野言俚說不必去也。此滑稽之所以傳也。金富軾之傳愚溫達，其意亦出於是歟。

25. 李種微《修山集》卷 10〈題太史公天官書後〉（天官書）：

此與政事俯仰，最近天人之符者，非史遷不能道也。

漢學研究中心出版品

朱子學的開展——學術篇

漢學研究中心叢刊 論著類第 8 種

鍾彩鈞主編／漢學研究中心編印

定價：新臺幣 350 元（國內）、美金 15 元（國外），含郵資

朱子學的開展——東亞篇

漢學研究中心叢刊 論著類第 9 種

楊儒賓主編／漢學研究中心編印

定價：新臺幣 350 元（國內）、美金 15 元（國外），含郵資

內容：本套書爲漢學研究中心舉辦「朱子學與東亞文明研討的」之論文集。

洽詢電話：（02）23619132 轉 351

郵政劃撥 07130991 號 「漢學研究中心」帳戶